

四夷馆与同文馆名称考

穆凤良

(清华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中国官方的翻译培训机构始于明朝的四夷馆。本为东夷的满族入主中原, 建立清朝之后, 四夷馆被清朝接收, 但是, “夷”字被拿掉, 又以鸦片战争为分野, 先后改名为四译馆和同文馆。改名的背后或者有来自外族的推力, 或者有来自外国的推力。然而, 持久的推力是国内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因为人民利益才是变革的永恒动力, 才是制度文明的落点。

关键词: 四夷馆; 四译馆; 同文馆; 制度文明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0062(2004)S1- 0064- 04

名称是社会文明的反映。其变化并非出于偶然, 而是与时俱进的。如此看来,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和朱丽叶》中说的“名字有什么, 换了名称, 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这作秀的话是不能当真的。因为名称的背后往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或历史故事。譬如, 如果考证中国官方翻译培训机构从四夷馆到同文馆的名称变化, 就会考查出中国社会变迁史的一个侧面及其背后的推动力。

一、四夷馆

四夷馆为四夷朝贡的交际需要所设, 始建于 1407 年, 即明朝的永乐五年, 是中国最早的官方译员培训机构。据万历年间修订的大明会典记载, 四夷馆“内分八馆, 曰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 选国子监生习译。正德六年(1511), 增设八百馆; 万历七年(1579)增设暹罗馆。”^[1](P687) 据《明实录》, 四夷馆置于长安左门外, 隶翰林院, 馆内习译生员, 人月给米一石。到了明嘉靖年间, 四夷馆已见颓势, 嘉靖四十五年(1566)“惟鞑靼、女真等馆, 共止有译字官四员; 回回、西番、高昌、八百等馆, 虽有教师一二员, 并无一名子弟习学。至于百夷、西天等馆, 教师久已病故; 缅甸馆师生俱各故绝。其见在

教师, 又皆正德初年选入者, 年深齿迈, 精力衰颓。”^[1](P688) 到万历年间, 四夷馆更其衰落。王世贞在《四部稿》中记载: “嘉靖前购诸夷书甚多, 学者惧其繁, 时时盗出毁其籍, 今惟鞑靼不废, 字多横出而直读。余各夷书, 母籍多失, 或间止一二页存, 略识数十字耳。遇夷人来, 则贿通事; 人问其意, 别造语译之, 要不失事情而已, 其实非本字也。报书亦伪作夷字, 以欺我人, 不恤外夷笑。”明万历八年(1580), 王宗载提督四夷馆, 著《四夷馆考》曰, “四夷馆……迨后肆习既废, 籍记无征。此馆几为马肆。”^[1](P689)。

鉴于四夷馆服务于朝廷接受朝贡的交际需要, 所以, 朝廷兴则四夷馆兴, 朝廷衰则四夷馆衰。

二、四译馆

没落的明朝四夷馆被清朝接收后被更名为四译馆。但是, 天下一统的内政和外交传统并没有改变。朝贡外交仍然是清朝政府教化周边的施政纲领。隶属礼部的四译馆, 相应而言, 主要接触的是中国的藩属国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有隶属关系的沟通中, 朝贡格式是封建秩序和管理模式的具体表现之一。但是, 这种模式推及到海外国家, 只是清朝一厢情愿的愚蠢思维模式。按照这个模式, 在外交文

收稿日期: 2004- 02- 15

作者简介: 穆凤良(1956-), 男, 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书的翻译中,不论是来自国内少数民族酋长的文书,还是来自海外番邦的国书或照会,一律被清朝政府按照朝贡格式作单边主义的改写,再呈皇帝御览。

例如,英使马戛尔尼谒见乾隆一事,英方的档案和清朝的文献完全是两样。举例说明如下。

例1 由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致函乾隆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作准备: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 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 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伸祝敬, 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 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 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 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 英王陛下特派自己的代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 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 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2] (P76)

英文版的培林爵士来函, 是为了马戛尔尼访华作前期的筹备工作。信中的呼语虽然非常恭敬, 但并非上下的隶属关系, 而是平行的外交关系。然而, 当时清朝政府根本就没有平等的外交概念, 所以, 负责此类交际工作的礼部, 必然要把外事作内务来办, 把不符合呈文格式的地方一律改写, 按照马祖毅的说法, “对一些重要词句不是未全部译出, 就是作了一厢情愿的修改”。

闻得天朝皇帝八旬大万寿, 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 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 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 凡有本国的人来广州与天朝的人贸易, 均各相好, 但望生理愈大, 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尼差往天津, 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 我国王即十分欢喜, 包管英咭喇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2] (P77)

例2 英使马戛尔尼转呈乾隆帝的英王来信, 是这样开头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 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 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 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 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 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 但在取得胜利之后, 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上给以同享和平的幸

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 陛下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 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2] (P77-78)

英王的来信, 自然不符合礼部的格式, 同样也要修改了之后, 才能呈报皇帝:

英咭喇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 英咭喇国大红毛及佛部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 恭维大皇帝万万岁, 应该坐殿万万年; 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 管的百姓甚多, 大皇帝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 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 内外安宁。各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 大皇帝恩典, 都照管他们, 叫他们尽心出力, 又能长进生发, 交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 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 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 本境平安, 造了多少大船, 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2] (P78)

如此的胡译和乱译, 是清朝体制弊端的必然反映, 而且当清朝的译字官无法作手脚的时候, 也就是皇帝大发雷霆的时候。譬如, 在马戛尔尼之后, 阿美士德又出使访华, 就觐见礼仪发生争议。嘉庆帝坚持要求英使施三拜九叩礼, 阿美士德认为那样有损人格和国格, 执意不肯。对此礼部也无法打圆场。如果是称呼格式, 不论阿美士德怎样称呼嘉庆帝, 翻译成华语都将是“中国大皇帝万万岁”。但是, 阿美士德不行叩拜礼, 就拆穿了我国皇帝的朝贡外交面子。所以, 嘉庆帝在大臣关于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奏章上写满了“所言甚属欺诳”, “支吾可恶”等语[3] (P250), 坚决不见英使, 并下令轰其出境, 为以后的中英战争埋下了伏笔。

这些虽然与四译馆无直接关系, 但是, 四译馆曾经是隶属礼部的, 礼部的朝贡礼仪格式必然反映在四译馆的理论和实践中。

三、同文馆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败再败, 其诸多的后果之一是清朝的礼部和理藩院因此被改组。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 清朝于1860年成立了总理衙门。政府原来的翻译人才培训机构四译馆也就不再起作用了。取而代之的是归属于总理衙门的同文馆, 于

1862年开始聘请西洋教师配合中方培养适合新形势需要的翻译人才。

翻译人才面临的新形势,有三个特征:其一是要了解西俗。过去,翻译有固定的朝贡外交的格式和华夏中心观。这是中英一战再战的原因之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中,英国人规定,双方今后必须平等交往,呈交给中国地方或中央官员的文书,可以称为“照会”(Communication)、“声明”(statement),或“宣言”(declaration),但是,不可以称为“恳求书”或“请愿书”(petition)。^[4](P91)在给对方政府的照会中,不得使用“夷”字。^[5](P133)虽然清朝的夷字,仅指外国人,但是,从字型上看,“夷”是一个持弓射箭的人。它所代表的是落后于农耕文化的狩猎文化。另据司马迁记载,黄帝之曾孙高辛氏,即帝喾,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视之,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号曰蛮夷(《史记·五帝本纪·风俗通义·佚文·四夷》;又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其贬义不言而喻。因此,北宋学者石介(1005—1045)提出,“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这种恪守夷夏之大防的思维与英国发展经贸的需要大相抵牾。而且仅仅就这个夷字的冲突,使得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战役在英国的枪炮进犯中输得惨烈,其正义主张居然没有得到来自任何西方国家的策应,待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敌对方在英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法国。可见,如果正义染上了狭隘的文化色彩,不一定占有得道的多数。政治或经济冲突背后往往还有文化的纠纷。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曾经因为中方把他的职务译作“夷目”(foreign principal),再回译成英文,变成了“野蛮人的眼睛”(barbarian eye),而恼怒。如果不是因为他到位时间不长就病死,恐怕第一次鸦片战争要提早三四年的时间。因为战败,清朝除了在政治经济上让利于西方,在文化上也不得不让步。于是,自古就有的夷字在对外的文书中消失了。

翻译人才第二要面对的是擅长外交谈判的实用

翻译。过去洋人访华,所呈文书都要自备华语文本。但是,英方在《天津条约》第50款中提出,以后英方提交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一律使用英文。暂时附华语副本,但是,解释依据为英文版本。期间,中方要建立自己的翻译队伍。^[5](P131-132)中方在签订《天津条约》之前,也受到了不通夷务的窘迫。英法联军打到通州时,受命议和的恭亲王奕訢命英国战俘巴夏什代他致书联军统率求和。巴夏什在信尾写了两行英文字,奕訢乃至满朝文武不懂其意,不敢启用。到处查访懂英文者,最后才知道是巴夏什的签名和日期^[2](P62),结果推迟几天议和,朝廷被迫撤走,任凭英法联军洗劫北京。

翻译人才要面临的新形势之三是,既然清朝已无威以示四夷,就只有走求同的道路了。早在唐朝就有鸿胪寺改名同文馆的前例,这一次同文馆则不仅改名,从内容到方向都作了实质性的调整。同文馆成了有特色的西学东渐的中心。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例,他于1865年开始接触同文馆工作,1869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在同文馆工作了30年,把同文馆建成为译述国际法的中心。因为“强迫中国接受帝国主义世界”^[6](P227),光靠列强的炮舰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国际法维持。

面对西方列强,清朝的对抗一再受挫。此后中国的一味求和又被西方传为笑话。譬如,当首份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即将签字的时候,中方主谈耆英却问英方,“还有什么其它的要求吗?”^[4](P95-96)清朝的没落由此可见一斑。

从四夷馆、四译馆到同文馆,这变迁的推力都是来自外面。明朝四夷馆因为来自满族的推力而改名。满族本是后起的东夷,入主中原后,改写四夷馆为四译馆,很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气魄。当满族与汉族同化后,他继承了汉族的华夏中心观。直到列强的炮舰打破了华夏中心观,才有同文馆应运而生。然而,不论是四夷馆、四译馆还是同文馆,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变革,不是为了中国人民利益而变革。所以,它们不能适应国内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解决国内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只有出于人民利益的变革,才是促进制度文明进步的变革,才是变革的永恒动力。

参考文献:

- [1] 方豪. 中西交通史(全二册)[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1987.
- [2]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3] 龚缨晏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 [A] 黄时鉴 东西交流论谭 [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4] Gregory, John S. The West and China since 1500 [M] Houndm ill,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5] Lydia H. Liu. Legislating the Universal: The Circ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Lydia H. Liu. Token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 [C] Duke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8-158
- [6]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

A Survey of the Name Change from Siyi Guan to Tongwen Guan

MU Feng-li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Chinese official translator training agency was established in Ming Dynasty as Siyi Guan (the Imperial Training Agency of the Barbarian Languages). When the Manchus, categorized as the East barbarian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bias, came to rule China, it took over Siyi Guan and renamed it firstly as Siyi Guan (the Imperial Translation Training Agency of Regional Languages) by replacing the yi of barbarian with a yi of translator before the Opium Wars, and secondly Tongwen Guan (The Imperial Translation Training Agency of Universal Languages) after the Opium Wars. Such changes of titles were pushed by external forces, either from minority people or from the foreign powers. But the push that lasted the longest was from the contradictive movement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For people's interest is the eternal need that generates motivation, on which the institutional progress will be landing.

Key Words: The Imperial Training Agency of the Barbarians Languages; The Imperial Translation Training Agency of Regional Languages; The Imperial Translation Training Agency of Universal Languages;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